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民国要闻探秘

03

《民国春秋》编辑部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法庭终于开庭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的东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废墟——的包围中，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座小山上，一幢侥幸躲过了美军燃烧弹的庞大建筑孑然孤立，尤为醒目。这里原属陆军士官学校，二次大战中，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用作礼堂。经几个月按美国建筑样式修整，已焕然一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持续两年半，开庭 818 次的东京审判，即将在此处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战争的所在，如今成了清算战争罪犯的场所。

这幢建筑的大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上一株业已枯萎的松树上，钉着一块褐色木牌，两行黑色的英文告诉世人：“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 8 点 42 分，一辆深土黄色的大型军用客车，和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吉普车停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门前。20 多名美、英、澳、中、日等国的记者已在此等待多时。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 A·S·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待了几句。8 点 50 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启。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国服”——“国民服”，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大将。第二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八人瘦小、干瘪，他即是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人拄拐棍，着西装，他名叫重光葵，担任过外相。隔了两个人，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的矮老头，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眼睛不停地眨巴眨巴的贺屋兴宣（前藏相）走在最后。他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 1 米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者们摄下这 26 人各自的“尊容”（开庭第一天上午，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大郎尚未押到，下午才坐上被告席）。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走进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期两年半的审判，从此拉开帷幕。被作为甲级战犯审判的，有东条英机等 28 人。

法庭内，高高的审判席上，坐着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 11 位法官。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博士（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坐在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的左侧。美国的法官坐在韦伯的右侧。各位法官的身后分别悬挂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法官席的前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席、辩护方代表席。大厅另一面，跟法官席相对，是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土肥原等被告，后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身后站着戴白头盔的美国宪兵。法庭还设有 200 个记者席位，以及数百个来宾席、旁听席。

预定上午 10 点开幕，可能因讨论辩护团的抗辩书，延至 11 点 17 分法庭执行官庞米塔才宣布开庭。11 名法官，除苏联的扎里亚诺夫穿军服外，其余一律穿法官长袍。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

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庭长韦伯致开庭辞说。

法庭开幕之日下午，开始宣读长长的起诉书。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国际检察局费时5个月起草的起诉书，列出3类共55条诉因。3类诉因是：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二类，杀人；第三类，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这份厚达42页的起诉书读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已过去8个月。东京审判迟迟才开始，缘由何在呢？

还在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就宣布，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正之审判。同年12月26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并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决定，“同盟国最高统帅为补充投降条款，得发布一切命令”。次年1月19日，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依据上述授权，命令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同日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法庭的组成、审判程序和适用法规等作了规定。根据该宪章，麦克阿瑟任命了英、美、法、荷、苏、中、印、澳、新西兰、比、加等国的11名法官，并以澳大利亚人韦伯为庭长。法庭的法定人数为法官的半数以上；法庭的判决根据超过半数的出庭法官的意见作出。具体他说，11名法官中有6名法官（过半数）出庭，即可开庭；6名出庭法官中有4名法官（过半数）赞成，便可作出判决。

东京审判中的检察工作，由盟军最高统帅部下的国际检察局负责。检察官分首席检察官和陪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任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菲等国的10名检察官任陪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ewc MVIMAGE,MVIMAGE,!09800140_0186_1.bmp}

在讨论起诉书时，曾发生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主张，为了向世人表明日本本国人民也要求审判那些将他们引入歧途的人，有必要起用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会议记录没有记下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的名字，据推测，“可能是英联邦方面的发言”。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派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国际审判的意思，它想用所谓“自主审判”代替国际审判。

由于东京审判为美国所操纵，审判的准备由美国单方面进行，澳大利亚和苏联表示不满。澳大利亚认为，东京审判不应由美国主导，而应由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和各同盟国政府共同负责。但在美国的反对和英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苏联认为，根据美国起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有重大差异：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设置预审官，陪席检察官也不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可以独立行动。因而它没有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东京审判。经美苏间多次交涉，及美国方面的一再敦请，苏联检察官C·A·戈伦斯基才于1946年4月13日到达东京。姗姗来迟的检察官还有：荷兰检察官鲍格尔霍夫·马尔泰，1946年3月19日抵达。法国R·L·欧涅特检察官和菲律宾P·罗佩斯检察官均于4月2日抵达。而印度检察官G·梅农赶到日本时，法庭已经开庭。

{ewc MVIMAGE,MVIMAGE,!09800140_0187_1.bmp}

在苏联等国的检察官来到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选定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于苏联的拖延，它几乎未能参与“构成检察活动核心的被告选定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逮捕战犯嫌疑者

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 10 多天，就开始一批批逮捕日本战犯嫌疑者。

1945 年 8 月 28 日，一支由 258 艘各种类型军舰组成的美军特混舰队浩浩荡荡驶入日本东京湾。隔了一天，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厚木机场。9 月 8 日，麦克阿瑟驱车前往东京，下榻于原美国大使馆。至 10 月，进驻日本的美国军队已有 50 余万。

美军开始占领日本时，距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周。这段时间内，东京尚未被炸毁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销毁各种绝密文件。1939—1945 年裕仁在宫中主持帝国大本营的记录，全部焚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秘密警察的档案绝大部分付之一炬。这项有计划的销毁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罪证的活动，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国际审判预作布置。

迄 1945 年 12 月 6 日，麦克阿瑟公布了六批战犯嫌疑者名单，根据这些名单，逮捕的甲级战犯嫌疑者超过 100 人。1945 年 9 月 11 日的名单包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 39 人。11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前首相小矶国昭及前外相松冈洋右等。12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皇族梨木守正亲王等。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名字列入了 12 月 6 日的名单。

东条英机在逮捕令下达之前就作好了自杀的准备。1945 年 9 月 11 日下午，美军来逮捕他时，他要求略等片刻。然后到洗澡间洗了个澡，穿上崭新军服，走进书房，将门反锁好，用 32 毫米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对着医生用炭笔画了圆圈的心脏部位开了一枪。也许因为年岁大了，画了圆圈的地方皮肤下垂，也许因为适逢心脏收缩，子弹从他那颗畸形的细长心脏下方穿过，只差一点便打着心脏。他倒在血泊中，被送进医院抢救。美军医生不想让他死得太便宜，要让他活着受审。于是，东条活了下来。

次日下午 5 点，日本第一军司令杉山元元帅在牛込军司令部自杀。其妻子启子在世田谷家中获悉丈夫自杀的消息后，走进佛堂，穿上一身白衣，用短刀往心脏部位猛刺一刀，遂即倒地身亡。

前首相近卫文麿在日本投降后曾活跃了一阵。他进入战后成立的东久亲王内阁，任国务相。还曾以“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身份从事改定宪法的工作。他自以为可以一显身手，再展宏图。那知 12 月 6 日黄昏，传来了将要逮捕他的消息。入狱的前一天（15 日）晚上，他和妻子千代子等谈话至凌晨 1 点左右，又和次子通隆谈了 1 个多小时，3 点左右进入自己的卧室。早晨 6 时，妻子走进去一看，他裹着一身白布，横卧在雪白的被褥上，已断了气，枕边放着一只褐色小瓶子，里面还残存几滴毒药。近卫留下遗书一封，内称：

自日中战争以来，我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但是，作为所谓战犯，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使我难以忍受。在自杀的战犯嫌疑者中，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代表性，即宁可自杀也不愿受逮捕和审判之辱。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在日本军政界，一时自杀成风。陆海军将领自杀的，计 34 人。

曾经推荐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前内大臣木户幸一，于 1945 年 12 月 6 日下午 7 时从广播里听到麦克阿瑟统帅部向他发出逮捕令的消息。8 时半，他接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那么多的人都传去了，我也

因此有所准备，知道一定会来找我。至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被追究战争责任，那要看对方的看法，我无从知道”。10日晚，裕仁天皇为木户饯行。天皇对藤田尚德侍从长说：“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从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人”。晚宴上，天皇对木户说：“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体。我们事先谈一谈。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让你为我充分说明。”木户听得出来，天皇是要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洗刷。回家的路上，木户见到了都留重人，都留劝他说，要充分做好辩护准备，因为美国的想法，内大臣有罪则天皇亦有罪，内大臣无罪则天皇亦无罪。于是木户打定主意要进行辩护，以便为自己开脱，同时也为天皇开脱。

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选定被告的工作从1946年3月11日开始，其时苏联等五个国家的检察官尚未到达。至4月1日，共开会9次，确定了一份27人的被告初选名单，加上悬而未决的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共29人。4月8日，陪席检察官会议就这份名单进行表决，通过了一份26人的名单。初选名单中有3人被排除，他们是石原莞尔、田村浩、真崎甚三郎。首席检察官基南指示将土肥原贤二从被告名单中划去，未获陪席检察官会议通过。苏联检察官于4月13日到达后，要求追加5名被告。陪席检察官会议表决的结果，将其中二人，即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追加为被告。加上先前选定的26人，共28名被告。其中陆军军人15名，海军军人3名。经麦克阿瑟批准，这28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这28人是：东条英机、东乡茂德、铃木贞一、松冈洋右、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大岛浩、星野直树、桥本欣五郎、永野修身、嶋田繁太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武藤章、小矶国昭、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贺屋兴宣、木户幸一、畑俊六、木村兵太郎、佐藤贤了、冈敬纯、南次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重光葵。

中国两次提出的战犯名单，共列有33名战犯，其中有15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要不要追究天皇的责任

在选定东京审判的被告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发出了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呼声。

裕仁天皇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人物，表面看来，他似乎只是日本名义上的元首，实权操于内阁之手，而内阁又为军事首脑所左右。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家倾向于认为，日本是一个受东条之类狂热顽固的将军们控制的警察国家。分析家们不知道，东条不过是天皇陛下唯命是从的奴仆。”日本栗屋宪太郎著《东京审判秘史》写道：“在战前的日本，在公务上执行宣战、讲和、缔结条约权限的唯有天皇一人”。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曾这样谈到天皇的权威：“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能违逆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或日本国的高级官员尤其如此。”每一届日本内阁都按天皇旨意组成。各届内阁首相及内阁成员，无不对天皇奉命唯谨。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日本内阁换了12届，天皇就用频频更迭内阁的办法，保持他的绝对权威，而防止内阁权势过重，威胁皇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写道：“在审讯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极权的君主，因批准开战应负足以构成起诉的责任，……”

在审讯中提出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先前的看法，证据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开战，因而对战争负有责任。”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和杉山元元帅的日记，都表明天皇参与了战争。例如据杉山元日记记载，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 11 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作出评估。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文件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告口供，都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亲自指导日军在淞沪战场的作战；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天皇向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表示“异常满意”；这类事例甚多。

正因为裕仁天皇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故澳大利亚提出的战犯名单，将裕仁排在第七位。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备忘录写道：天皇“正式批准 1937 年侵略中国（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因天皇下了开战诏书而开始的。……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但是，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基南，根据麦克阿瑟的意图，将裕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划去了。基南并指示：绝对不得将天皇当作被告或证人。

麦克阿瑟何以回护天皇？他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仍奉若神明，重建日本，就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这种影响；而把天皇作为战犯交付审判，就会出现动乱，为了对付日本举国上下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必须投入远比目前进驻日本的军队巨大的兵力。

{ewc MVIMAGE,MVIMAGE,!09800140_0193_1.bmp}

还在 1945 年 10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就通过一项议案，决定让麦克阿瑟在日本秘密调查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并就是否将天皇作为战犯提交审判提出建议。1946 年 1 月 2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寄去了一份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日本战犯名单，上面列有包括天皇在内的 62 名战犯名字，并命令他着手对战犯起诉。1 月 25 日，麦克阿瑟急切地向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发出一份电报，说是没有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不应将其作为战犯控诉。电报还说：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 100 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云云。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被麦克阿瑟所说服，美国政府同意按麦克阿瑟意见办。如何处置日本天皇这个棘手问题，就交由麦克阿瑟去处理了。

麦克阿瑟采取这样的保护天皇的策略：“从速审判东条和他的 1941 年的年阁成员，借此避免扩大调查范围，以免牵连天皇”。

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天皇的责任问题，就像避开雷区一样。裕仁终于被保护下来，他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

对这样一个使人大惑不解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是这样理解的：

“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质力量，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置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个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但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 1945 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生死与共。”

细菌战、毒气战问题被搁置一边

日军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意回避，未予清算。

关于细菌战问题，国际检察局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关东军防疫供水部（七三一部队）对 3000 多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俘虏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感染试验、活体解剖，和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还有七三一部队的分支，驻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即多摩部队）在中国浙江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证。但是，国际检察局并未将这些资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国际检察局内，美国人托马斯·H·莫罗对细菌战、毒气战问题最为关切。他在交给基南的题为《日中战争》的备忘录中，写到了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他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准许国际检察局审问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罪犯，七三一部队的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军医和北野政次陆军少将军医，遭到拒绝。

不准审问石井、北野二人，到底是谁作出的决定？直到 1983 年才揭出谜底。这年 8 月 14 日《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麦克阿瑟保证：免究细菌部队的战争责任》的报道。文章说，1945 年秋，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部长 C·A·威洛比少将和桑得斯去见麦克阿瑟。威洛比提出：要查清七三一部队内幕，只有作出这样一项保证，即不把七三一部队的人作为战犯追究，调查才能顺利进行。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桑得斯把麦克阿瑟关于“不作为战犯追究”的许诺告诉了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故第二参谋部拒绝把石井交给国际检察局审问。

莫罗审问石井的请求不被允准，便专程来中国，先后到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搜集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的证据。他从日军俘虏处得到了日军使用毒气的证词，从中国的外科医生处得到了他们为很多受日军毒气伤害的中国士兵进行治疗的证词，还见到了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毒气武器。莫罗访问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从档案中读到了这样的资料，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 36968 人（内 2086 人死亡），并见到了被日军芥子气毒害致死者的照片。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和派到中国军队中的美军联络官 J·H·斯多塔上校向莫罗证实，日军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使用过毒气。

莫罗回到东京后，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检举材料，写成了题为《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1937—1945》的报告书。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 年 9 次，1938 年 105 次，1939 年 455 次，1940 年 259 次，1941 年 231 次，1942 年 76 次，1943 年 137 次，1944 年 38 次，1945 年 2 次，总计 1312 次（1945 年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开庭后不久，莫罗就被调回美国了。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他的主张跟法庭的方针相牴牾，或许他是被作为“免究细菌战和化学战责任的障碍”排除的。

除了莫罗提供的资料外，国际检察局还得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 1942 年 11 月 3 日编成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这是一份由负责毒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日军中枢机关编撰的重要资料，因而对审判工作特别有用。有人认为，“倘若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把检察局搞到的《例证集》等有关毒气的资料提出来，再由有关证人出庭做证，那么，日军的毒气战便会

被清楚地揭露、证实，法庭将受到非同寻常的冲击。从国际检察局搞到日本军方核心资料的情况来看，要证实日军的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

在东京审判中，对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犯下的罪行竟免于追究责任。检察官提到这个问题，庭长韦伯就要打断他的话：“这件事对我们审判官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好吗？”

国际检察局在开庭前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但在起诉书中将这部分内容删除了。

下面是美国检察官 J·W·费利在选定被告阶段讯问东条的一段记录：

问：“在日中战争期间，（日军）是否对杀伤性气体和刺激性气体加以区别？”

答：“我想后者——促使咳嗽和流泪的气体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过。”

问：“难道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不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吗？”

答：“催泪气体以及促使打喷嚏的气体，世界上所有警察都在使用，您的国家也在使用。”

问：“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在国际法上没有被禁止吗？”

答：“实际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使用，原子弹怎么样？”

东条坚不承认日军实施毒气战的罪行，不但如此，还借美国使用原子弹一事来反唇相讥。意思是说，原子弹比起毒气弹来如何，美国不是使用了吗？你怎么不去追究美国的责任？

法庭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为何要免于追究日军实施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呢？据云“除了独吞‘科学和武器’的情报外，这也许还和投掷原子弹的责任有些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就已开始研究细菌战和毒气战，也得到了日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报。战后它怀着特殊的兴趣想把日本的研究资料由它一家秘密接收过来，而不愿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些资料，更不愿在法庭上加以揭露。二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它害怕倘若在法庭上追究日军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辩护方会以提出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责任问题相回击。美国正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小心地避开了毒气战、细菌战问题。

对 25 名战犯的判决

东京审判从 1946 年 6 月进入检察方面起诉阶段。1947 年 1 月转入辩护方辩护。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延至 1948 年 4 月 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在开庭将近两年之际，终于走完了漫长的审理途程。这期间，法庭提到了 1602 份书证，传唤了 524 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 31 天，速记记录长达 6033 页（打字纸）。公诉方发言持续 14 天，速记记录长达 3126 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原拟在这次审判结束后，再进行一轮国际审判，把第一次审判中未予起诉的战犯嫌疑者，作为第二次审判甲级战犯的被告。由于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美苏冷战之风一日紧似一日，新的国际审判不再具备条件。

在审理结束前夕，4 月 13 日，《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

并在法庭内外引起不小的风波。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 25 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这篇报道说，25 名被告（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二人死亡，大川周明因发疯免于起诉，28 名被告剩下 25 名）中，被判处死刑的预计有 13 人，他们是东条英机、武藤章、铃木贞一、嶋田繁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畑俊六等。有的辩护人曾就此事向检察官提出交涉，认为这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干扰法庭审判。

1948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点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 10 章，加上附属书，总计达 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 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 25 名被告有罪的判定。25 名被告均被宣判有罪。3 点 55 分，庭长韦伯开始宣布量刑：

荒木贞夫，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绞首刑；
桥本欣五郎，终身监禁刑；
畑俊六，终身刑；
平沼骐一郎，无期徒刑；
广田弘毅，绞首刑；
星野直树，无期徒刑；
板垣征四郎，绞首刑；
木户幸一，无期徒刑；
木村兵太郎，绞首刑；
小矶国昭，无期徒刑；
松井石根，绞首刑；
南次郎，无期徒刑；
武藤章，绞首刑；
冈敬纯，无期徒刑；
大岛浩，无期徒刑；
佐藤贤了，无期徒刑；
重光葵，监禁 7 年；
嶋田繁太郎，无期徒刑；
铃木贞一，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有期徒刑 20 年；
东条英机，绞首刑。

另有 3 名被告因病未到，由 3 位辩护人在自己席位上起立接受宣判。3 名缺席被告，贺屋兴宣，处无期徒刑；白鸟敏夫，处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处无期徒刑。

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由于双手颤抖厉害，意译风怎么也戴不好。松井石根衣履不整，头部不停抖动，活像只瘟鸡。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走来。30 几架相机的镜头一齐对着他，他微微向左边歪着脖子，仰视着天棚。“绞首刑！”他嘴角朝左边一咧，笑了。然后拿下意译风，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那里有他的家属。

判决宣布了，但 11 名法官并不全都同意判决。庭长韦伯曾主张，对所有被告均不处以极刑，而把他们交给各同盟国，放逐到人迹不到的遥远的荒岛。

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菲律宾法官贾纳尼拉和荷兰法官博林要求加重对大多数被告的量刑。印度法官佩尔可能出于佛教徒的“仁慈为怀”，全然不同意判决。法国法官伯纳德也对判决持否定态度，他的理由是，不该放过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天皇），而惩处这些只能被认为是他的“帮凶”的被告。首席检察官基南口头上同意判决，私下里说“这些判决太愚蠢”。他反对把松井石根处死。

尽管有这些异议，庄严的判决仍然作出了。在这过程中，中国法官梅汝璈曾怀着不判处土肥原、松井石根等人死刑，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极力请求法庭处土肥原等人以极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判决后，辩护方面曾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对判决重新审查的要求。11月24日，麦克阿瑟驳回重审要求。

25名战犯中有7名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演出了一场闹剧。他们是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嶋田繁太郎、冈敬纯、佐藤贤了、东乡茂德、木户幸一。麦克阿瑟居然宣布，被处绞刑之7人及其他各犯暂缓处刑。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宣布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消息传开，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行文美国最高法院，要求该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出于无奈，驳回了7名日本战犯的上诉。

1948年12月22日深夜，盟军最高统帅部涉外局宣布，对7名判处绞刑的战犯，处刑于23日凌晨零点到零点35分之间进行。23日4点10分，涉外局特别紧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处死刑的7名战犯，他们的绞首刑于23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1分开始，33分钟后结束。

应麦克阿瑟之邀，作为临刑人到场监刑的，有美国代表威廉姆·J·西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利比扬格中将。

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18名被告，其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病死于1949年，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病故于1950年，平沼骐一郎于1952年病亡。重光葵于1951年11月刑满出狱。其余被告荒木贞夫、南次郎、畑俊六等均陆续被假释或提前释放。

至于未被作为被告审判的数十名战犯嫌疑者，在东京审判开始后，就一批批悄悄地从巢鸭监狱获释。1948年12月2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17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释放。

东京审判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次审判可指摘处很多，但它是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它对铲除侵略势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无疑有巨大作用。东京审判定下的铁案是不容推翻的。

夏里

（第186页为东条英机照片，
第187页为板垣征四郎照片，
第193页为土肥原贤二照片）

西安偷运黄金案见闻录

1944年，我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任采访主任。某日，西安西关外飞机场殷站长下大红帖招待记者，还专派吉普卡来接。会上大办筵席，对记者们大吹一顿，又领着记者参观飞机场，要求记者报道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在抗战军兴时刻所作的努力，以振奋士气。

可是不到一个月后，听说殷站长因偷运黄金案被枪决了。社长李贻燕特来编辑部打招呼，不准发关于殷站长被正法的消息。李贻燕，当时人们称之为翼老，年已60开外，留日学生，同盟会老会员，其居室内挂有同孙中山先生合照的褪了色的照片。抗战军兴以来，他身兼10余职，诸如陕西省党部副主委兼宣传处长、新闻检查所主任、省参议会副议长、市参议会议长、抗敌后援会副会长，力行中学校长，西北文化日报及西安晚报社长，西安市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西北师范学院党史讲师。等等写不完的要职，似乎是名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葳先生的化身。他打招呼之后，任何报纸都不敢刊载这一消息。只有民主同盟办的工商秦风联合报用4号字标题：“殷站长伏法”，全文不过20字，已是“胆大包天”了，终于受到新闻检查所的警告。

事隔几天，李贻燕特来找我：“你拿我名片去德泰祥钱庄找毛老板，就说有什么消息，尽管交下，一定发表。”毛老板叫毛虞岑，西安的大财神，有“西安的黄金荣”之称，他有一个“一毛不拔”的“美名儿”。凡属与“德”字联在一起的店号如德记银楼、德华金店……都是他经营的，其网络远至洛阳、成都、宝鸡、兰州、渭南。他和蒋纬国的丈人石凤翔有八拜之交，两人合办大华面粉厂、大华纱厂，名盛一时。据说他理财得法，用人得力，特别善于应酬省主席祝绍周，对祝则是万毛也拔，慷慨得很；对石凤翔更是有求必应，因此他就能在西安工商界、政界翻云覆雨，捧他的人就应接不暇。他的架子很大，不买新闻记者的帐，从来不接待记者。

这时毛虞岑托石凤翔、祝绍周的福，也当上了省参议员，李贻燕又是副议长。有了李的名片，毛虞岑破例接见了，寒暄几句，立即从口袋取出一个信封，双手恭恭敬敬地交给我：“这消息请主任呈交翼老。”

我辞出后，看看信封是封口的，感到奇怪，但也不便私拆，由于一肚子狐疑：既是交给记者的报道材料，为何要封口。因此我先找总编刘毅商量。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来的，处事精干，我视之如师。

刘说：“此中秘密，你还蒙在鼓里，殷站长为什么招待记者？从来不接见记者的毛虞岑为什么突然接见记者？你真是个糊涂记者！殷站长偷运黄金，传说这些黄金都是毛虞岑的，这信可能是托翼老‘辟谣’，企图推卸罪责，既是托我报发表，我总编有权拆信。”

不拆则已，一拆愕然！我和刘总都呆了，竟是两张支票，一张50万，一张30万。（当时金价约5万元左右一两，约值15两黄金。）

总编呵了一声而又笑着说：“毛虞岑手段真辣，50万是给翼老的，30万是给你的，你成了敲竹杠记者了！”

我大吃一惊，在一分钟内，总编给我连扣了两顶帽子，糊涂加竹杠记者。我真莫名其妙，就追问根由。

总编说：“我也是道听途说，讲不清楚，等晚上发完稿，我俩去翼老家中，他会和盘托出的。”

翼老是麻将迷，经常通宵夜战。见到我俩不速之客，心中有数，由他儿

子接力战，起身接待。

翼老问我：“去德泰样怎么样，消息拿来了吗？”

总编风趣地说：“拿来消息两条，一条 50 万，一条 30 万！”

翼老失望地说：“怎么这一点，不行，明天你俩再去，叫姓毛的加码，没有 500 万不行，偷运黄金 100 条，就拿出这么一点儿能混过我李某人！”

总编正色问道：“请您老摊摊牌，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说清楚，叫我俩怎么下手，难道连我俩也不相信？！”

下面是翼老的谈话：

“毛虞岑发了一辈子横财，‘人无横财不富’，在他身上百分之百的应验。他是河南人，年轻时在绿林出身的将领任应岐部下做过副官，掌管军需后勤，任应岐失败后，他卷走大批军粮军款，在郑州开烟膏店起家，西安事变前又和杨虎城某部下挂上钩，代运黄金、烟土，从西安、洛阳来回倒卖，杨虎城失败后，他又将大批黄金、烟土私吞，腰缠万贯。抗战军兴后，洛阳沦陷，他到西安坐庄开银号钱庄，又和石凤翔打得火热，拉上省主席祝绍周和蒋介石的关系，从金融界一步登天钻进政界。特别是近一年来勾上西安空军站殷站长（一说姓尹），利用空运从西安到成都偷运黄金，来回倒卖，盈利二五分成，殷站长买通地勤人员，坐收渔利。起初每次只带 10 根左右，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从 10 条到 20 条、50 条，上月竟一次带 100 条，也就是 1000 两。飞机起飞时，驾驶员发现载重负荷指针超载，唯恐出事，停飞检查，于是破获了这桩大案，这真是空军史上最大奇闻。有人传说是利用美军空中堡垒 B26，实际上这次利用的仍是中国空军军用飞机。

毛虞岑办事精得很，他的成都德泰样金店负责人，早已买通成都空军站地勤人员，发觉飞机停飞检查，立即电告毛虞岑，可毛虞岑早已与殷站长私订攻守同盟，约定如一旦东窗事发，毛许诺从优抚恤其家属，殷许诺有罪一肩挑，决不咬出毛来。正当毛托石凤翔、祝绍周设法为殷解危时，胡宗南立即下令从速处决，说什么这是执行‘五权宪法’。”

总编插问：“这与‘五权宪法’何干？”

翼老讥笑说：“这是胡长官定出的军法新招，凡国民党高级党员犯军法，执行‘三民主义’，即枪决时打三枪，前两枪打在身上，第三枪打在后脑；凡国民党高级将领犯军法，执行‘五权宪法’，即枪决时打五枪，前四枪打在身上，第五枪打中后脑，这样叫犯罪者多承受几分钟痛苦，以示严惩。这不去谈它，殷站长被枪决后，成都军法处虽没收全部黄金，但仍在追查这黄金究竟出自谁手，因每根条子上的印记，均烙有德泰祥银楼字号。事发后毛虞岑仍托石凤翔去重庆设法营救，愿再向

国家捐献 500 根条子，表示赎罪，反正抗战需要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毛虞岑、祝主席都向我打招呼，要求新闻界不发消息。我是做到了，可是他仍只拔这一点点毛，叫我怎么分给各报。”

我插上说：“我从德泰祥出来时，门口碰上西京日报和西安晚报的采访主任进去，可能也是奉他们社长之命去敲竹杠的。”

翼老八字胡一翘气愤地说：“这怎么叫敲竹杠？这是毛虞岑应该出的买命钱，他发了那么多横财，何止千根条，万根条，现在叫他拿出 100 根条捐助西安报界，也是合情合理的，在他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总编站起来，向翼老告别：“我们就是饿死，也是不去的，我看毛虞岑的神通比您老广大得多，加码是不可能的。毛虞岑一毛不拔是有名的，今天

已拔出黄金 15 两，真是拔得他心痛肉痛的了。”讲完将两张支票交给翼老，辞了出来。后来听说毛虞岑为抗战捐了 500 根大条，又给河南灾民捐了 5000 袋面粉，遂化险为夷，为河南灾民所称道。

彭古丁

冯玉祥珍藏的毛泽东名片的来历

冯玉祥生前一直珍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一张名片。现这张名片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这张名片的呢？这就得从冯玉祥和毛泽东重庆相逢谈起。

1945年8月，蒋介石接受政学系的献计，三次电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建国及民主进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

冯玉祥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由衷地表示欢迎。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中共党员频繁接触。1926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留下了美好印象。从30年代初开始，冯研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深深赞同共产党的救国救民纲领。1933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八年抗战期间，冯玉祥始终不渝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他翘首企盼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疚不便前往，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到重庆后风尘未洗，立即会看望这位为抗日奔走呼号、为民主劳碌奔波的老将军。冯玉祥对毛、周、王仰慕已久，对于他们的登门拜望尤为感动，决定去回拜他们。30日下午，他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等的临时住所——重庆桂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公馆，不意毛、周、王三人因事外出，但特地给冯玉祥留下各自的名片。毛泽东的名片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冯玉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背后分别写上“卅日下午四时住张部长（在毛的名片上写的是‘治部长’）公馆”，并把这三张名片贴在当天的日记页中，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纪念。

9月1日，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集会，庆祝《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八周年。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孙科、覃理鸣、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出席，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等也与会。宋庆龄身穿一身洁白的衣服，满面春色，当场致词。冯玉祥受大家的欢迎讲了话。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共产党的友谊。会议气氛十分友好亲切，许多旧友重逢，感慨万千。

当晚，冯玉祥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席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作东，宴请毛、周、王等，由冯玉祥和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畅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后来，周恩来又说到汉奸问题，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溥仪他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讨论题目后，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三十四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指1917年讨伐张勋和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接着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列了出来。冯心情舒畅地说：“若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散席后，冯随毛、周、王一起回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

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了自己的车上，一直把毛泽东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深夜 11 点多钟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象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永不要再有战争。
陈晓清

（第 210 页右面为毛泽东名片照片，
左面为冯玉祥在名片背面写下的字）

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大后方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青团书记张治中早在1944年8月间就接到蒋介石手谕，要利用美援装备，组建12个师的青年军，发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踊跃报名。

然而。这场颇有声势的“从军运动”，却事与愿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演出了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当时，作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奉命发动报名，他首先要求中央党部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积极报名，以资号召，但是搞了几个月，几乎没有一个人报名。吴铁城很难堪，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报名抽签”，中者从军。规定了凡是年在36岁以下的，都要报名。这样，引起了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笔者当时在中央党史会工作，刚好36岁，党史会及龄者16人。主任委员张继召集会议，会上并没有一个人报名。会后在主管人事的周永成策划下，把一张开会签到纸作为“志愿”报名名单呈报了上去，当时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宣传报道。于是，会议参加者一致否认，在中央党史会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发动大家联名向“总裁”申明没有志愿报名，开会签名单不能作报名依据。不仅中央党史会，其他各单位青年党务工作人员也群起反对，中央组织部闹得也很凶。吴铁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又想出了要蒋介石亲自到会训话，以达到动员青年党务工作人员报名的目的。

1945年3月19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中央纪念周，我是搞速记工作的，参加中央纪念周记录是常事，并不在意。奇怪的是，这无纪念周和往常大不一样，中央纪念周参加者原是党政军高级官员，而这一次排队依次入场的都是青年，更出乎意料的是不让我担任记录，还通知我和其他的9人（党史会、组织部各5人）站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这是不寻常的。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在行礼如仪，读“总理遗嘱”后，蒋开始训话。他脸色严肃，讲了1小时之久，讲到最后，声色俱厉地要大家回去报名从军。

纪念周结束，蒋介石站着不动，没有离开。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本来很小，后面的人不知道蒋没有退席，一哄而散，争相离开会场。蒋介石见此情景厉声斥责：不许乱跑。我们10人被指定站在原地不动，有一些元老如吴铁城、张继、陈果夫等也都在场。蒋介石开始对我们10人训话，讲了5分钟，最后说：“你们自己不去从军，还煽动别人，这是破坏从军运动，今天我以总裁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会场上肃静无声，显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高喊：“总裁，我有话要说……”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大叫：“宪兵带下去。”原来，党史会同人中有一人只因反对抽签做法讲了公道话，也叫来“听训”。其中一位是年已40的许处长，另一位则是年过花甲，曾跟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姜老先生，就是刚才高叫有话要说的那一位。于是他也被列入“破坏从军”罪的名单。陈果夫、吴铁城看到这情况，扶着蒋介石出去上车，我们被带到了国民政府一间屋子里。

吴铁城原意是想对青年党务工作人员训一顿，杀鸡儆猴，把10个人拎出来做做样子，想不到弄得假戏真做，蒋介石竟然要“军法从事”。消息传出，整个中央党部人心惶惶。同情我们的，不断把消息传到小屋子里来，一会说，形势紧张，你们要被送去陆军监狱；一会又说问题不大。还有人来告诉我们

看见吴铁城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濬到中央党部，吴铁城送何出门，连声说“拜托拜托”，何成濬说“交给我办好了”。我们听后心情仍然忐忑不安，因为“破坏从军”这顶帽子，毕竟不是儿戏啊！

天快黑时，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两路口桂花园，车停后只见许多人围了上来，他们都是中央党部所属各单位的青年，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同情，特地赶来慰问我们。桂花园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总监办公室，在两路口北面山坡下，古老的两进厅房，显得阴森森的。我们被带进去时，昏暗中看见何成濬立在办公室门口，望着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好像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尚未坐定，就叫我们到楼下吃饭，5个人一桌倒有4个菜，我们奇怪了，难道这像牢房的囚饭吗？事情也许不是那么严重。

第二天下午，10人被带去见总监，大家又忧又喜，忧的是可能要提审了，喜的是总监亲自传见，也许问题要解决了。出去时，大家有意要我走在前面，大家都知道何成濬认识我。以前党史会要何成濬写辛亥革命回忆录，是他口述我记录整理的。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我分明记得他家里办公桌上有一尊金光灿灿的佛像，还有一个小香炉，这怕是他“执行军法”的忏悔吧！

我们被带到办公室，见室内布置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和几张凳子，何成濬坐在办公桌边，要我坐在他旁边。一开始就对大家说：总裁总是这样的，你们是党员，不曾从军，既不是军人，怎么送到我这里来呢？既然来了就当住旅馆吧。又说：从军也没有什么不好，多点经历嘛。那次谈得很多，将近一个小时，还提到有位师长叫余程万，在长沙战役打了败仗，委员长几次下令枪毙他，我没有杀他。现在，委员长不是又叫他上前线戴罪立功吗？他笑笑伸一个小指头，你们这点点真是小事。听到这里，我们才如释重负。临走时，他交代副官说，允许别人前来探望。他还吩咐副官把秘书办公室腾出给我们住，安排好伙食等等。这倒有点真像住旅馆了。

第五天，副官进来点了3个人的名，说是总监叫去他那里，3个人都是党史会的，除姜、许两人外，我也在内。一到办公室，见张继正坐在那里，后来知道张继是来领回姜、许两人的。我也在被领人员之列，恐怕这与我曾与何相识不无关系。

事情至此还没有了结，还得向蒋介石交差，接着，中央党部呈报蒋介石说：8个人已“志愿”要求从军，案子已经结束。于是，我们8人被指定于4月12日到了驻江津的青年军202师606团，象征性地过了20天的军旅生活。

居正修